

导论

○魏月萍 朴素晶

“儒学”作为汉字文化圈共享的思想文化资源，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实践的人文价值与传统意识。长期以来，当代儒学研究的探讨范围多聚焦于东亚，尤以台湾、日本和韩国为主，经过长时间的研讨和累积，已有丰硕的成果。其所勾勒出的儒学面貌繁复多元，同时铺展出儒学长时段的传播、演变与接受过程。相对而言，东南亚儒学的传播与发展，虽也历经长久时间的演变，却难以勾勒出一幅较完整的传承图像，关键原因或在于“儒家思想和华人”的关系，在东南亚不同的地方脉络，受到该地政治文化以及教育环境的影响或限制，形构的意义不尽相同；加上文献条件贫乏、儒学经典诠释根基薄弱、文字传统零碎等因素，使其长期受困于“有儒家思想，但无儒学”，以及是否更适合用“儒教”来指涉新加坡儒家思想传承的争议窠臼。然而，无论是儒学还是儒教，叩问与追寻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与生命力，已是当代刻不容缓的事。多年以前，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先生曾以“花果飘零”来陈述儒家思想的境遇，余英时先生也感叹“儒门淡

2 东南亚与东北亚儒学的建构与实践

薄，收拾不住”，儒家思想的生存状态看似亦浮亦沉，影响力实未曾减弱，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儒学作为一门学说或学术思想，其影响固然无法脱离政治因素，但那并非是根本，让儒学回归“人性自主”，以自我、自求、自主为终极目的，才能还以儒学朴素的原始面目。唯有根本确立以后，儒学作为历史或思想文化资源，不仅是个人生命价值的凭借，它对人间秩序规划的总构想，便能成为政治与社会文化秩序重建的重要参考资源。反思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建构与实践，不仅有助于理解儒家思想义理内容的拓展，让思想概念能够转化为行动实践，如杜维明先生的“同心圆”构想，视儒家思想为从内往外推展的儒学之道，有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它与个人、社会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因此，追问“儒学”是否能助于公共事务的推动和参与，追求更民主开放与良好公民文化与伦理规范？儒学与现代公民应维持怎样的关系？如何寻求一套可转化并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公共儒学价值，以有助于落实一个具仁爱、有同情心、讲求合理及有良好道德规范的公民儒家社会等问题，便至关重要。这种种问题不但能展现儒学的气魄，安顿儒学与个人的关系，也能使儒学与个人的公民性不相违悖。儒学或儒教，它能形成个人与社会文化重要的道德基础，促使个人“文化意识宇宙”的精神力量，承担起个人于社会应扮演的角色。

为了进一步研讨以上诸问题，在2013年5月3日至4日，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办，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协办，举行了“现代儒学与公共性：东南亚与东北亚儒学的建构与实践”学术工作坊，冀借助东南亚与东北亚不同的儒学研究视野，打开一个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参照彼此的儒学建构与实践经验，对现代社会的儒家思想问题，或提出历史脉络的回溯，或梳理与重构儒家的思想概念，或针对现实政治与社会文化情境提出回应与合理的解释。本书各篇论文即展现了学术工作坊的讨论成果。

本书共有十二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包括“总论”（两篇）、“东南亚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变革”（四篇）、“韩国儒家思想的重构与实验”（三篇）以及“儒学的公共性与现代性”（三篇），希望从各种角度思考和检视东南亚和东北亚儒家思想的发展状态。在各篇论文中，出现儒家、儒学、儒教等不同的词汇，乃因应儒家思想在各地传播的不同样态，以能更贴切描绘儒家思想的当代图像。

总论：“东南亚”与“东北亚”视角

在准备“现代儒学与公共性：东南亚与东北亚儒学的建构与实践”学术工作坊时，我们遇到一个能很好地说明为何这本书的出版是及时和必要的问题。制作海报时，我们原本将会议题目翻译成英文“Modern Confucianism and Public Consciousnes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in East Asia”，但有一位老师指出，如果只说“East Asia”，那在英文语境中只能指东北亚（即中韩日等国），而不包括东南亚国家。的确，普遍而言，“East Asia”无论从地理或者文化的角度，都可定义为亚洲的子区域(sub-region)，但对于为何东南亚国家不被包含在“East Asia”，即字面上“东亚”的范围，并无任何细致的探讨。多数英美学界的研究著作都依从这种不合理的讲法，即以东北亚为“East Asia”而以东南亚为“Southeast Asia”的翻译。因此，即使“Northeast Asia”对英语母语者而言是别扭的，我们最后还是采用了一个冗长而复杂的标题，即“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in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east Asia”。尽管“东亚”在概念原则上应包含“东北亚”及“东南亚”，但我们已惯于将东亚与东北亚之间划上等号，这是应予以纠正的语言实践。此外，这种约定俗成的想法不仅使东南亚国家与“东亚”疏离，而且从东北亚国家（如韩国）和东亚其他区域逐渐弱化的连接感来看，也造成东北亚国家与“东亚”疏离。

在第一部分“总论”中，白永瑞教授在〈重思儒学与公共性：“中国特色的”普遍主义的将来〉中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这篇本是专题演讲稿，但其发言内容以及所勾勒的问题意识，说明各参与者因发言主体位置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自觉、儒学意识以及周边感觉等问题，因此在编排此书时，我们决定把这篇论文独立处理，成为本书总论之一，冀能为本书总体的问题意识，作出提纲挈领式的提问。另一篇论文，则是李元瑾教授的〈儒学在东南亚的承传：新马印之比较研究〉。李教授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地（“新马印”）为比较对象，勾勒出东南亚三地儒学发展中，中国元素和本土元素彼此消长的历史进程。她的东南亚视角，充分表现出她的历史思维以及明确的主体发言位置，和白教授的提问遥相呼应。

白教授所设想的“东亚”并不是狭义的东北亚，而是包含东南亚在内的广义的东亚。首先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地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起笔，也提及作为新兴工业国的新韩两国的共同点，但他更加强调新韩两国作为中国周边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他指出，围绕着当今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对外扩张往往被经济学者怀疑为新型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有官方主导的文化大国构想的嫌疑。有学者（许纪霖）认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不是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自觉，而是人类普遍的文明自觉，提倡“新天下主义”即以儒学为根基的全球普遍文明的构想。白教授认为，如果新天下主义只限于重构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话，也许可以成为批判“欧洲普遍主义”的“中国特色的普遍主义”，但无法成为“全球性的普遍主义”，因为这个视角仅仅是另一种“中国中心主义”。

因此，白教授特别关注近期由黄俊杰等学者提出的“儒学在东亚”的一些论调，即将东亚视为一个非固定、多文化交流的接触空间，同时批判造成“中心—周边”从属原则的中华中心主义。但他指出，这样的谈论也忽略了构成东亚世界的多样因素之间所存在的等级性。他强调在东亚等级秩序中的场所性，即位于周边的主体的生

活世界意识。整个东亚世界包括中国都有被西方中心的世界观周边化的经验，但在东亚内部的等级秩序中，中国与周边国之间也存在“中心—周边”的非对称关系。这一非对称关系并不是单方向的支配或附属，而是不断进行战略性互动过程中维持平衡的双向关系。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心—周边”之间的脉络性转换过程中，周边国的位置与作用的重要性可从中凸显出来，例如处于儒学文明中小国主义的韩国的儒学，可以成为儒学普遍性的度尺。由“东亚”再脉络化的这种小国主义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这份自觉可以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确立并扩大自我决定权的思想基础。白教授认为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东亚达到的小国主义的自觉，也可以成为大国周边的其他地区寻找新发展模式的重要依据。白教授认同并欣赏新加坡知识分子的种种探索过程，如对在新加坡普遍存在的现成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挑战，以及在探讨儒学这种传统思想资源同时，也进行对当代多种文化资源的批判性分析。

相较于白教授对“中心—周边”以及“小国主义”的反思，李元瑾教授追溯新马印儒学在殖民地时代和建国以后的发展脉络与生长样态，让我们了解东南亚的儒学传播，如何受到历史进程、现实政治、教育与文化水平的影响，进而表现出不同的“保儒模式”。论文以纵横两种切入点，归纳三地之间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考察了中国和当地因素如何主导儒学的发展。尤其是，新马印三地的强势政府，对华人分别采取多元文化政策、整合政策和同化政策，是导致三地儒学承传际遇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李教授认为，考察16至19世纪殖民地时期新马印三地的儒学，不能忽略“中国元素”的主导作用，其中包括移民华人的中国背景、中国在东南亚的布置、中国的政治事件以及中国思潮等因素。论文中检视了华人移民东南亚的概况、清朝领事馆的角色，以及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鼓吹的维新运动，对新马印的儒学传播和孔教运动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元素”主导下，三地不但兴起办学热潮，各文学

和文化活动及组织也应运而生。纵然如此，李教授也指出，在共轨互动中的三地，仍可检视出其相同和差异的地方。例如从指导思想、活动内容、领导人物互动、宣传组织互动以及建庙互动五个层面，可以窥见三地复兴儒学与孔教的共性特征；但从领袖出生、政治介入、宗教色彩和语文使用这几个方面，又得以把握新马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明显差别。这当中又和殖民地政府所提供给华人移民的政治和文化空间条件有紧密关系，这些条件深刻影响了华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

新马印独立建国之后，李教授认为“本土元素”取代“中国元素”发挥了主导作用，导致新马印之间的关系益加疏离，同时强化了彼此的差异性，国家建构、族群之间的互动问题，成为三地关注的核心。以新加坡儒学发展为例，儒学发展的际遇和起伏，和华文教育的命运相系，极大程度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例如在1980年代曾经有过炽热的儒学运动，最终却无疾而终，此后儒学转入民间和高等学府寻求其生存机遇。马来西亚的儒学热浪也受到政治力量的推动和影响，如1990年代的回儒文明对话，抑或读《论语》运动等。但另一方面，民间亦通过主办各种儒学研讨会及出版儒学刊物等，培植儒学文化土壤和生命力。而印度尼西亚的儒学或孔教，受到政治政策的影响，更加的宗教化，形成李教授文中所言“儒学在中国境外以宗教形式存续的另类模式”。

东南亚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变革

本书的十二篇论文，新加坡学者和韩国学者各占半数，新加坡学者的论题涉及越南儒学的传播、孔教大纲、儒家思想教材与民间宗教等，不仅勾勒出儒学与东南亚的历史关系，也可了解儒家思想如何涉入政治理念、教育和宗教等层面，呈现多重与层次分明的“东南亚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变革”。在这个部分中，首先掀开序幕的是有关越南儒学的研究论文。

在东南亚历史语境当中，越南儒学和中国儒学的渊源最深，历史也最悠久。李焯然教授的〈越南儒学与河内文庙〉，利用河内汉喃研究所收藏的汉文文献，考察了越南儒学的传播与发展。论文指出，越南儒学发展较为单纯，缺乏多样化，深受中国官方儒学的影响。例如，明代永乐期间颁赐的《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鹭》、《孝顺事实》等书，深刻影响越南的儒学教育。另一方面，李教授认为，曾是越南第一所最高学府的河内文庙，是儒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文庙的建筑特色、祭祀与配享，可以了解越南国子监的特色。唯一可惜的是，当汉字被喃文所取代，再发展为拼音文字后，儒家思想随之没落。

劳悦强教授的〈《民国必要孔教大纲》：林文庆的建国方略〉，则以在新加坡19世纪末的华族领袖林文庆于47岁所撰写的一本“倡兴儒道，立国化民”的书——《民国必要孔教大纲》为研讨重点。论文探索林文庆在康有为孔教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如何试图转化传统儒家思想为新时代的孔教，而通过此书不只可窥探林文庆对儒学的总体认识，其念兹在兹的，是为中华民国拟定一套建国方略，以儒教作为政治纲领与宗旨的政治理想。

梁秉赋博士的〈新加坡华校语文课本中的儒家思想教材〉，以新加坡华文中学曾经统一使用的《华文》课本为分析文本，拣选与儒家思想有关的代表性课文作重点分析，追溯新加坡学生如何接受儒学原典的启蒙，以及新加坡教育对“君子儒”的培养。论文具体指出，通过论学、做人以及对国家尽忠的孔孟语录的筛选，课本编纂者有意灌输“个人其成就生命之最大意义与价值的道德场域”，应是社稷而非私我。

魏月萍教授的〈马来西亚民间宗教的“儒家化”与“公共性”：以真空教为分析对象〉，关注的是儒家思想和民间宗教的关系。魏教授以民间宗教——“真空教”，探讨宗教儒家化与公共性的关系，尤其是真空教教义对儒家思想义理的吸收，如何转化为宗教的道德基

础，以“公德”和“公共之理”开拓宗教公共领域。此外，经由儒家思想与宗教的相互交融，重新考究社会原来持有的公私观念，如何致使宗教化的儒家思想转化为普遍的公德、可操作的道德实践，借此达到利群的成效。

韩国儒家思想的重构与实验

新韩两国是共处于周边的周边即“双重周边”的国家。两国的学术交流不仅是两个小国之间的交流而已，而可以成为突破从前的“中心—周边”模式的契机，进而探索使中心与周边互动借鉴的新模式。如果我们在各自的“场所”共同探讨多种儒学思想资源中产生的思想课题，我们的学术交流也有可能脱离儒学复兴的中国中心主义，而能在恢复东亚儒学的实践中发现真正的公共性。将我们的视野扩大到广义的东亚，通过“东亚”的新角度来重新反思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这可以说是推动新加坡与韩国的学术交流的根本动机。

新韩两国都是“周边”当中很特别的“场所”。新加坡的重要意义在于以它为基点或网络，我们能够将探讨扩大到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其他“场所”，并进而深入东南亚社会运动的各种侧面。韩国之特别则因为其拥有将儒学再脉络化的长久历史实践，也通过这种特殊经验，韩国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将儒学价值内在化的倾向，所以在由东亚思想资源探索新发展模式的共同课题上，韩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参照。

韩国常被视为“东亚世界中最具浓厚儒教特色的国家”，同时也被称为“东亚世界中最迅猛地开展民主化运动的国家”。韩国的这种将儒教和民主都发展到高峰的面貌，也许是世界文明史上非常罕见的例子。以下五篇韩国学者的文章是当代韩国知识分子对于当代与近现代韩国历史上产生的儒学与公共性问题的讨论。经由韩国学者对儒学的反思和重构的探讨，以及再脉络化的儒学对韩国社会起到的作用

等，读者们将能深入理解韩国儒学的特殊实践。在“韩国儒家思想的重构与实验”这一部分中，前两篇的讨论重点放在“东学”，即实践儒教公共性并试图实现自己理念的宗教运动，第三篇则展现出韩国知识分子的当代中国政治儒学话语。

朴素晶博士的〈韩国东学对儒教公共性的革新与实验：东学的自我认识与主体性〉显示，韩国思想史不是反复转述或墨守中国儒家思想传统的历史，而是不断摸索内化和演进的历史。论文关注代表韩国本土思想的近代自觉的东学思想。在面临西方思想的冲击时，朝鲜未出现的东学，更新了传统社会中的自我观念，并揭示了不论地位或性别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的近代主体意识。朴博士认为，东学的自我认识是对儒学这一历史悠久的思想资源的批判性重构，也是对儒学与公共性问题的重大挑战。

如果说上文讨论的是从东学思想内部对儒教的继承与批判性重组的话，许洙教授的〈东学合法化运动时期“道·义”论述的性质：以19世纪末的“教祖伸冤运动”为主〉，则考察在东学作为宗教的历史进程中平民公论场的形成。许教授说明东学教坛在“教祖伸冤运动”即东学的合法化运动中，显示出从宗教性请愿到反对外来势力的义理谈论的变化。东学教坛的早期请愿和其与政府之间的讨论集中在“东学是异端还是大道”的问题，但在后续提出的上疏文里不止有请愿而且还包含了“斥倭洋”的宣言。这一阶段东学教坛与政府之间的论证焦点是“倡议”。而东学合法化运动的最后阶段是“民会”。东学教坛利用“道·义”等具有儒教色彩的言论寻求认可，但朝鲜政府将东学的公共谈论看作是平民侵犯了儒教知识分子的特权领域。

罗钟奭教授的〈韩国民主主义和儒教文化：韩国民主主义论的预备性考察〉，挑战了韩国社会将现代化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朝鲜儒教的主流观念。罗教授认为，这只是由于朝鲜曾因西方文明的冲击而灭亡的历史经验，进而导致的一种“精神上的殖民性”。他更进一步主张，韩国人对儒教价值的内在化，反而在韩国社会转向民主化的进程

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积极评价朝鲜持续五百年的儒教政治文化，以士精神、民本精神，以及知行合一的态度等为例，说明儒教文化如何在韩民主国民主化过程中，对韩国学生运动及民众运动起到作用。

儒学的公共性与现代性

如前所述，本书不仅注重不同区域的儒学发展，也重视儒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究竟儒家思想如何为现代社会提供思想资源和动力，“儒学的公共性与现代性”中的三篇论文或可提供不同的反思观点。李晨阳教授的〈论儒家的平等与不平等观念〉集中于“儒家的平等”概念，提出在儒家对社会理想的构想当中，重视“比例性平等”甚于“一对一的平等”，把前者视为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儒家相信个人在道德完善、潜能和实现才能中有着不可避免的差别，故提倡劳动分工的必然性、合理性、有效性。李教授在论文中以道德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为论述要点，参照于西方的平等理论观念，以新颖观点诠释儒家平等观念的当代内涵。

站在当代韩国社会的立场讨论韩国儒学，朴荣道教授的〈儒教的公共性文法与其民主的含意〉，显示了韩国知识分子对经历长久考验的韩国儒学的深刻理解和信任。朴教授突破过去韩国思想界将儒学和民主看作一种对抗矛盾的态度，例如“孔子死，国才活”或“孔子活，国才活”等，提出儒教的公共性文法的重组可能性。他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的民主主义的危机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公共性的破坏，但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告诉我们，单纯加强国家公共性也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他回顾在东亚思想史里儒教所担当的历史实践，从中摸索对儒教与公共性的批判性重组。

赵京兰教授的〈当今中国儒学复兴的条件：现代性与民主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将当今中国的儒学复兴运动看作是对过去一百多年经历的自我否定的逆转，即回归自身文化认同的积极现象；另一方面，

也对最近中国大陆新儒家、新左派以及自由主义者都将本身的主张与儒学联系的状况，表示担忧。赵教授特别关注蒋庆等中国大陆新儒家所提倡的“政治儒学”的主张。在她看来，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台湾或海外新儒家所主张的心性儒学而提倡作为政治制度的儒学，即便缺乏对时代的考虑，但还是被认为是现今“最为强力主张儒学本质的书籍”。她在期待儒学复兴论述的同时也表示担忧——中国儒学若要成为永续思想，就不应该是“权力—知识复合体的儒学”而应重建“作为批判论述的儒学”。

纵观以上所述，我们期待新加坡和韩国能在未来持续进行学术交流，这不仅仅是缩小两国之间文化及心理上的距离，而且能够发展为互相学习与劝勉的伙伴关系。双方不仅可在儒家课题上继续交流，甚至可以扩大彼此的关怀领域，在深入的对话中找寻更多的历史对话，以更好把握两地所衍生的“场所性”。

本书作为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出版的《南洋人文丛书》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第五本，正是希望通过东南亚和东北亚经验长期的交流与互相参照，找到经验借鉴与转化的重要资源。本书只是一个起点，但愿在未来能开拓更多不同的学术议题，并通过新韩两地知识分子的频密沟通与连动，累积更丰厚的学术与思想资源，开展出东南亚和东北亚各自独特的思想特色。